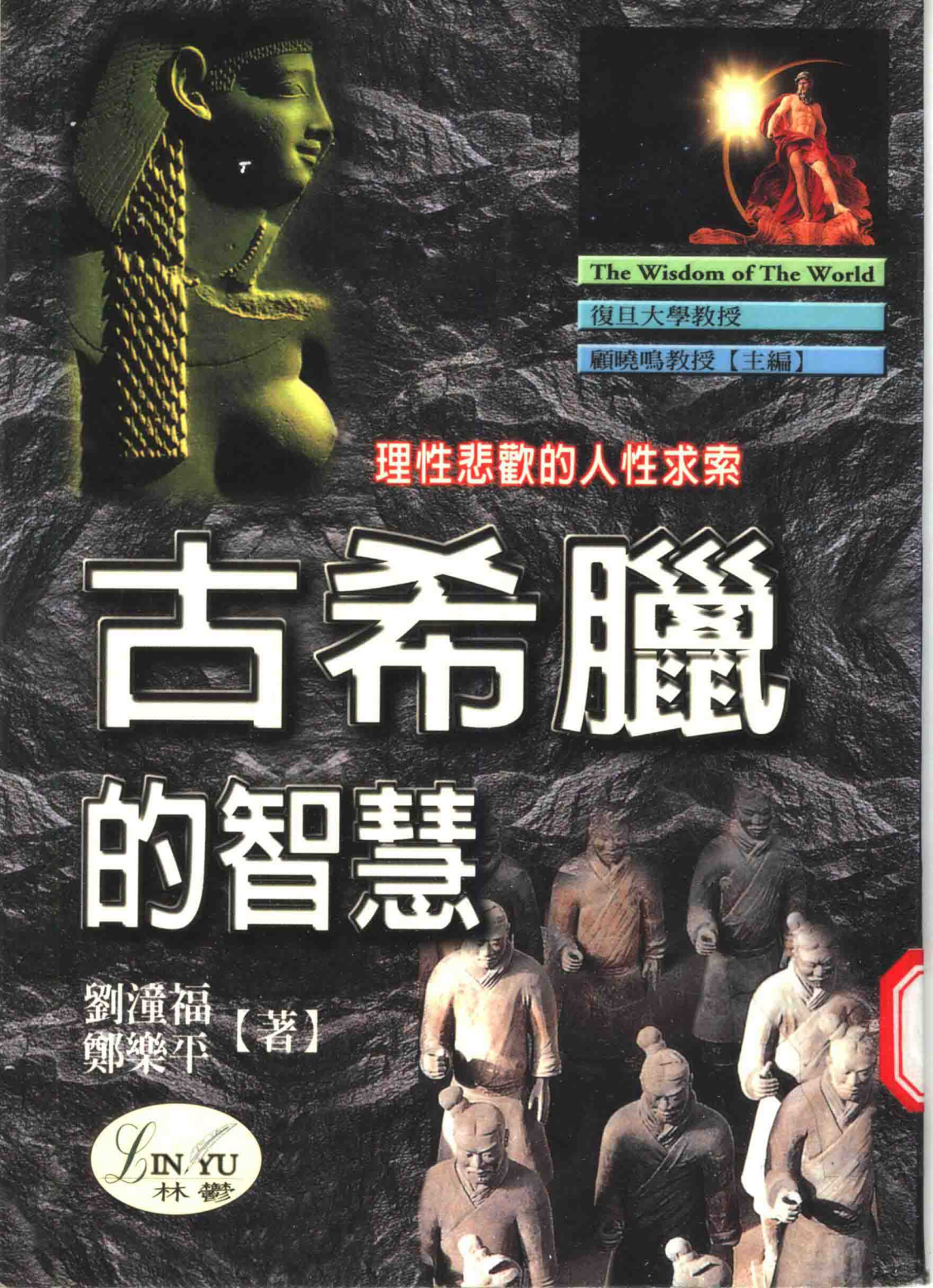




The Wisdom of The World

復旦大學教授

顧曉鳴教授【主編】

理性悲歡的人性求索

古希臘 的智慧

劉潼福 鄭樂平【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古希臘的智慧 劉潼福·鄭樂平著. --初版. --臺
北市：林鬱文化，2000 [民89]
面：公分. --(世界的智慧：4)
ISBN 957-754-730-3 (平裝)

1.民族性－希臘2.希臘－文化

535.7495

89005713

世界的智慧 4

古希臘的智慧

NT\$240

劉潼福·鄭樂平／著

2000年7月／初版

〈代理商〉

紫宸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三段110號7F之6

電話(02)8221-5697 * 傳真(02)8221-5712

〈出版者〉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編輯部：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21巷11號3F

電話(02)2230-0545 * 郵撥：16704886

總管理處：台北縣深坑鄉萬順寮106號4F

電話(02)2664-2511 * 傳真(02)2662-4655 / 2664-8448

網址：http://www.linyu.com.tw

E-mail: linyu@linyu.com.tw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754-730-3

顧曉鳴／主編

劉潼福、鄭樂平／著

古希臘的智慧

《世界的智慧》總序

復旦大學教授 顧曉鳴博士

——
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凌晨三點，我困坐在幾十年有限的時間裡用有限的錢幣購買的圖書中間；即使書籍有限，小小居室也一片筆紙狼藉，雜亂無章。生存空間被學問和知識所擠迫，已經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更何況在一個經濟、經濟、經濟的時代。生命被這些故紙堆充填，能自詡是充實的嗎？頭腦為這些玄妙的字詞句所主宰，能自負為聰明嗎？夜半驚醒，想到苦讀半輩子，堆在身邊的這些古今中外的人類精神成果，卻仍是面熟陌生，一知半解。許多書不要說是細讀，就是翻閱一遍，也拖延日久，至今尚未做到。急功近利的世事又如此緊迫，如此誘人，這一份書債，何時了得？冷靜下來一算，像我這樣曾沾沾自喜地寫過《閱讀的戰略》的人，每天又是以讀書為業，就算日讀十萬字，一年也不過讀一百本中等厚薄的書。有書不多，姑以萬冊計，就

要讀上一百年。想到此，你說如何使人不憔悴？

一結未解，一結又纏將過來。時代如此快速地把我們拋入世界的大空間，各國的圖書、音像製品乃至軟盤讀物以如此繁複的語言，讓前所未聞和瞬息萬變的信息跨過擁圍身邊的舊書，湧到我們鼻子底下。舊債未了，新債又起，爲了追趕這世界文化的變遷，你說舊書一本不看，只看當天中英文的報紙、雜誌，一天廿四小時夠使了嗎？

那就不但要失眠，而且要「失讀」了。多少人在這一「現代閱讀悖論」的左右下，有意無意地走了短路——乾脆不買書不讀書，用中國民間的人生驗方，叫作「眼睛一閉，眼不見爲淨。」放下書本，立地成商，交際宴飲，瀟灑人生。莫道下海都爲了金錢，我所坦白的這種現代讀書困境，其實都在暗中起作用，只不過有志者試圖在實際經營和生活的過程中，使學問昇華；而無志者則試圖用「錢的增加」這一更世俗、更可見的尺度，使自己的心理平衡，從此可以安然不讀書罷了。

只是今日要賺錢，非得要讀書不可。美國一位叫作德魯克的未來學家，最近寫了一本書，叫作《後資本主義社會》。他預測往後的發達國家由兩大階層構成：一是知識階層，另一是服務階層。換成我們熟悉的話，也就是說，今後社會的一部分人是有本事出點子和用幹部的，另一部分則是根據別人的新思想、新主意去做成產品或進行實際買賣

的。就如今日的服裝店，「服裝知識分子」想出別出心裁的款式、色彩、質感等等，裁縫師傅根據這種構想，把衣領做得譬如左高右低，或者左有袖子右光膀子。做的人也許還會驚詫這種不倫不類的勞什子怎麼可以進入精品屋，賣出多於料子十倍、百倍的價錢，但行家已有新行話，叫作：這是現代人買一個「概念」。精品高價，幾乎都高在這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概念」上。

一切物質產品的知識附加值和文化附加值，已到了何等的地步，你只要到你我不敢踏進門的天文數標價的時裝屋和食府中去看看就行。就這麼一個「想法」加到一件區區的「東西」之上，價格便像孫大聖式的跟斗翻上去，使你我苦寫數月的稿酬變得幽默可愛，滑稽可笑。窮盡畢生在生產知識的人，看著窮盡畢生在生產金錢的人玩知識玩得如此得心應手，真的應該好好失眠一番了。

問題是，這種「玩知識」和「玩文化」，並非投機倒把，買空賣空，也不是巧立名目，欺世惑眾。「文化」和「知識」作為一種既區別於物質，又區別於思維的實體，曾被波普稱為「世界三」，加以哲學的思考。近年來，文化理論和社會生活進展，更深刻地把「文化」之可傳、可存、可買賣、可接受的客觀性顯現在世人面前；只要回憶一下過節、過生日派對時的體驗，就會覺得這種例子真不要太多了！

「文化」成爲「物」，卻比一般的「物」別有一種特性。這就是我們的文化在自己這裡司空見慣不稀奇，到了你們或他們那裡，卻身價百倍，其味無窮。文化的買賣做得好，那才稱得上一本萬利呢！精品屋裡賣的「精品」，除了做工上較講究外，不過是以最快速、最巧妙的方式販賣了異地、異族的文化而已。

美國名牌的童裝價格高出大陸本地童裝十倍有餘。賣的是什麼「東西」？令世人垂涎欲滴的美國文化是也。因爲這些精品童裝其實都是大陸一些鄉辦企業用經濟手段，買了個「牌子」（文化！）之後生產的。所以說，今日地球村裡最好的買賣，用商人的行話來說是「做」世界文化。門檻精的大酒店，三日兩頭推出「蒙古美食節」、「印度美食節」、「越南美食節」（早晚有一天會推出「愛斯基摩美食節」和「吉普賽美食節」），做的就是世界文化的買賣。況且人不但要吃，還要穿、還要用、還要玩，方方面面「做做世界文化」，可以變出多少戲法出來？

各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是可以上市的股票，正吸引越來越多的非文人來炒，那麼研究和生產「世界文化」知識產品的專家豈不理所當然地可以充當證券公司的角色來坐享漁翁之利了嗎！

不過，實業家要說話了，說是文化作爲物和產品在現代經濟中升值，只說對了事情

的一半，另一半雖說與廣義的文化——科技有關，但畢竟是實實在在的工農業和外經貿實業。此話甚是。但何為入關？即參加世界關貿總協定；就是真正進入世界文化的總體格局中；就是與國際接軌。實業無論實到什麼地步，都非得在一定的法規、制度、風俗民情中實行，文化、文化、文化，搞經濟的人可以輕視半點的吗？

何況世人高說入關時，還是有所忽視的。入關也罷，與國際接軌也罷，今日世界不要說東西南北各大文化對峙依舊，就是在今日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魁北克的法語文化還要鬧獨立；昔日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小小車臣的文化尚要在政治上出人頭地。北美貿易區、歐共體、東南亞、阿拉伯以及中亞、拉美等等，眼下已有目共睹的經濟區域化的內因，恰恰在於作為經濟活動背景和基礎的「文化」日益跑到了台前。與國際接軌的總課題，變成了認真真了解和熟悉這些地區和民族之文化的問題。入鄉問俗，做不到這一點，談什麼走向國際？

可以說，廿世紀走向廿一世紀的世界文化趨勢之一是：以日益國際化和世界主義文化彌散為一端，以日益族類化和地區主義文化獨立為另一端的矛盾格局的深化。新聞媒介天天在報導的協同和競爭、和平和戰爭、友好親善和暴力兇殺，都不過是這一格局輾轉而行的表徵罷了。

於是，了解世界文化，獲得世界各民族、各地區文化的知識，成了一切成功人士的必修課，也可望成爲九〇年代下半期的社會熱點。

兜了一個圈子，咱們又回到這些有關世界文化和各國文化形形色色方面的圖書堆之中。要了解世界文化，當然就得讀這些故紙玄文。但是，別提到更周全的圖書館的「書城」中去看一眼了，讀書人面對自己家裡的這點書都要發呆，浸沉其中已經變得傻乎乎了，這又如何能以身作則，使每天要算錢、每晚要應酬的「成功人士」安得下心來啃書本？就是普通老百姓，事實上不少人也因第一職業的生計或第二職業的扒分，早已擠掉了讀書的時間，連同公家發給的書報費。文化人怎麼好意思用花言巧語再來招徠已經活得很累的人們像自己一樣開夜車，背希臘、羅馬、法蘭西、英吉利呢？

所以，我們這些還身在世界文化研究崗位上的同志，心想得憑著一點責任心，爲這發展著的社會和進步著的人們盡一點文化人的責任。於是，如何尋得一種切入點，以簡馭繁，在不大的篇幅中把世界主要民族和地區文化，以可讀性很強又不失學術水平的形式，供應給億萬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讀者，成爲浙江人民出版社及周向潮先生與我們編作者反覆商談、密切合作要解決的課題。

用「智慧」來概括各種文化的內核，是我們做了幾年的學術方略。一九九一—一九

九二年《中國的智慧》叢書二十種出版，我們的思路在那套書及其總序中已有所體現。這套《世界的智慧》叢書則在更廣闊的視野中做進一步的求索。

《世界的智慧》的立意和寫作的總原則則是——

(1) 《世界的智慧》叢書成功之關鍵，在於編者和作者能否用智慧的眼光（得益於各種科學和藝術的敏銳眼光），通過獨到而翔實的材料（故事、趣聞、史實、語錄、道理），把所述文化的獨具一格的思維能力和行事技巧，以機智生動可讀的文字陳述出來。

(2) 因此，與「智慧」無關的一般文化史料萬萬不可輕易堆積起來；與「智慧」無關的一般哲學、宗教和思想史的論點，不必全盤羅列；與「智慧」無關的一般寓言教誨故事不可簡單陳述。簡言之，《世界的智慧》叢書有別於以「智慧」為名的思想史、哲學史、文化成果史、故事趣聞集等等。

(3) 因此，要特別注意本叢書對「智慧」的定位——

① 「智慧」之於「文化」，猶如語法之於語言。這種內在的思維、行事方式和結構，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內核性東西，普遍存在於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有形和無形的各個方面。要注意在器物、起居、活動、文藝、象徵符號等一切方面概括出這種內在統一的民族文化智慧。

②民族「智慧」的根本在於：每個民族都在面對生存和發展的處境和問題，形成自己的獨特思路和行動方式。這種「智慧」是每個民族獨特的環境和歷史遺跡的產物。因此，要結合若干史例，來展現這種智慧，使「智慧」更顯出所在文化的具體性。

③這種「智慧」的跨民族和跨時間意義在於：「智慧」是人類面對生存和發展的最本真、最原始的問題之產物。人類每一部分在每一時期所面臨的這種本原性問題是一樣的。《世界的智慧》叢書緊抓住這種文化的最本原性之問題，從而獲得刪繁求簡的方法論依據，從而使叢書在內涵和基本切入點上有一種根本的統一性。

④智慧既以抽象的思辨材料的形式出現，又廣泛彌散於市井生活的世俗層面。本叢書要自覺地把這兩個層面融合起來。哲理的框架是書稿深層的靈魂；而家常的、具體的、實用的表層則構成書稿機智可讀的文本。

(4)由於各書稿所述文化在大小、古今、歷史遭遇、文化材料及可利用的文獻上和我國研究的程度都不一樣，因此，叢書要求各書稿以最清晰的方式勾勒出該文化的智慧為原則，而容納不同視角和格局，容納作者獨到的觀察和敘述結構。

在整個編者與作者互相合作、相互切磋的過程中，我們共同創造著適合於自己的書稿所述文化的新格局和新型式。由於選題所列的各種文化大小不一，情況各異，因此，我們具體商量，分別對待。例如對於吉普賽的智慧和英吉利的智慧，我們採用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民族理論化和學術化的成果對於像英吉利這樣的文化來說，正是其民族智慧昇華和獨特之處。如果採用描述吉普賽智慧的那種方式，顯然是殺牛用雞刀了。所以，整部叢書之格局與所述對象——「智慧」，也有著非常複雜的關係。不求全，但求突出獨特的視角。因此，各部書稿之選擇角度、處理材料以及敘述方式各不相同；做得好，每一種書都以獨特視野和本地材料呈現出智慧的某一側面，而叢書彙為大觀，則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每種書的「不全」以叢書顯示的「智慧大全」來代償和襯托。

當然，我們儘管可以自我解嘲地說「智達而已矣」，但幾乎每位作者完稿之後，都不無遺憾地感到智慧真如一種幽靈，經過十五、二十萬字辛苦追尋，彷彿抓在手裡了，但更閃光的都又像在更遠處。我想，這種過程是正常的。明白此，才能覺悟到：智慧是不可能抓在手中的，它若即若離，永遠閃爍在我們之追尋及其成果的前方！

於是，「智慧」成了一種方法論，一種思維和人生的利器。把學問和人生定位在「智慧之尋求」上，也許能使我們超越物界、書界乃至知識界，接近於人類文化歷程和進程

的本真，接近於學名為「智人」的人類生存之本真。

至少，「智慧」就成了「榨乾」眼前堆積如山的故紙堆的知識加工器。作為文化人的編作者，以自己的智慧，消解語言和文化的壁障，把印在那已經發黃的劣質紙上的鉛字轉化為可供現代人消費和享用的「世界的智慧」。不敢誇口，但希望一冊十六、七萬字的書勾勒出所述文化的內在輪廓，一箭雙鵰，既提供與該文化打交道時必須知道的知識，又供應可為我們使用的文化眼光、路子和點子。

一言以蔽之，雜處世界之中，各民族和地區的智慧，乃是我們本身智慧的源泉。以同鄉人般的心態和身態，周旋、溝通和交易於世界各種大大小小的文化之間，豈不正是今日國際化世界的最大生存智慧嗎！

千句併一句，在與國際接軌的今天，上述智慧的接合是現代人百忙與讀書的困境和讀書與經營的兩難之方便法門。哪怕一天看五千字，一年半載也能把這十餘本《世界的智慧》叢書讀完了。既可掌握今日世界文化必需的知識，又可有多餘的時間打工，還可兩者結合，有大發展或大發財的機會。設計到這個地步，也算我們用心良苦了吧！

不過，我們也並非一味利他；學問和讀書正要藉這種略有創新的形式來獲得你的支持，更新自己、昇華自己。並且不怕見笑，文人們靠新的方式賣文，稍稍多賺些錢，添

些書櫃什麼的減輕一點藏書的壓迫感。擔心的是，文心不改，手頭略有寬鬆，更加放肆買書，這時恐怕連洗手間也得擺書櫥了。最後還是得從「智慧」中再動腦子，看看有沒有辦法進入「無書有智」的更高境界，屆時方可活得稍舒展些。具體來說，房間像房間，飯桌像飯桌，人生順理成章。書本對文人生存環境的侵蝕和污染可得到遏制，一介書生可望成為智慧大師或點子大王。無論如何，先把《世界的智慧》寫起來，編起來，讀起來再說，大家齊心協力一起幹吧！

前言

鄭樂平

智

慧沒有童年。有人將古希臘哲學喻為哲學的童年，因為西方哲學正是從希臘哲人那兒發展而來的。

然而，從智慧的角度來看，本沒有什麼童年、青年、中年、老年之分。智慧既在時間之中，又在時間之外，它往往具有跨時空、超時空的意義。

今人在可累積的知識和可計量的硬體方面確實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今人的愚昧並未見減少幾許；相對而言，古希臘人在學問和人生諸方面所透露出來的智慧，每每使我們感到汗顏。

當今世界日新月異，變化速度日趨快速。但學問和人生中的大問題並未改變多少，因為人類飲食男女之生理需要和求真、求善、求美之心理需要並未改變。所以有人認為

西方整個一部哲學史就是與柏拉圖對話的歷史。這話雖有點誇大，但也不無道理。

與古人對話，實際上是在重新發現自己、認識自己，那麼將古人在知與行中所體現的種種外顯和內隱的智慧抽繹出來，就並非勞而無功了。

古希臘民族是個愛智慧的民族。他們爲此而生，他們也可以爲此而死。蘇格拉底終年披著破衣爛衫，毫不介意，卻孜孜以求「認識自己」；泰勒斯放著近邊的事不顧，而忙於「遠觀天象」；阿基米德在大軍壓境，死到臨頭之際，還有滋有味地在沙土上演算著幾何題。他們可以爲了澄清一個問題而通宵達旦；他們也可以爲了一個智者的到來而興奮不已，半夜披衣去敲朋友的家門。

希臘人將世界展現爲可用理性來把握的東西，所以，他們「遠觀天象，近取諸身」，一心想把握隱藏在事物背後的「邏各斯」（類似中國老子所說的「道」）。不過「邏各斯」本身又是達到這一目的的工具，因爲「邏各斯」的另一層涵義就是「語言」和「理性」。這樣，運用語言和理性的過程也就成了認識「邏各斯」（「道」）的過程。

反觀中國老子的「道」，它不是通過語言和理性得以認識的，而是必須借助於直覺和悟性加以把握的。因此，「邏各斯」和「道」也就成了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的不同標誌。所以，有人稱古希臘以來的西方文化奉行的是「邏各斯中心主義」。